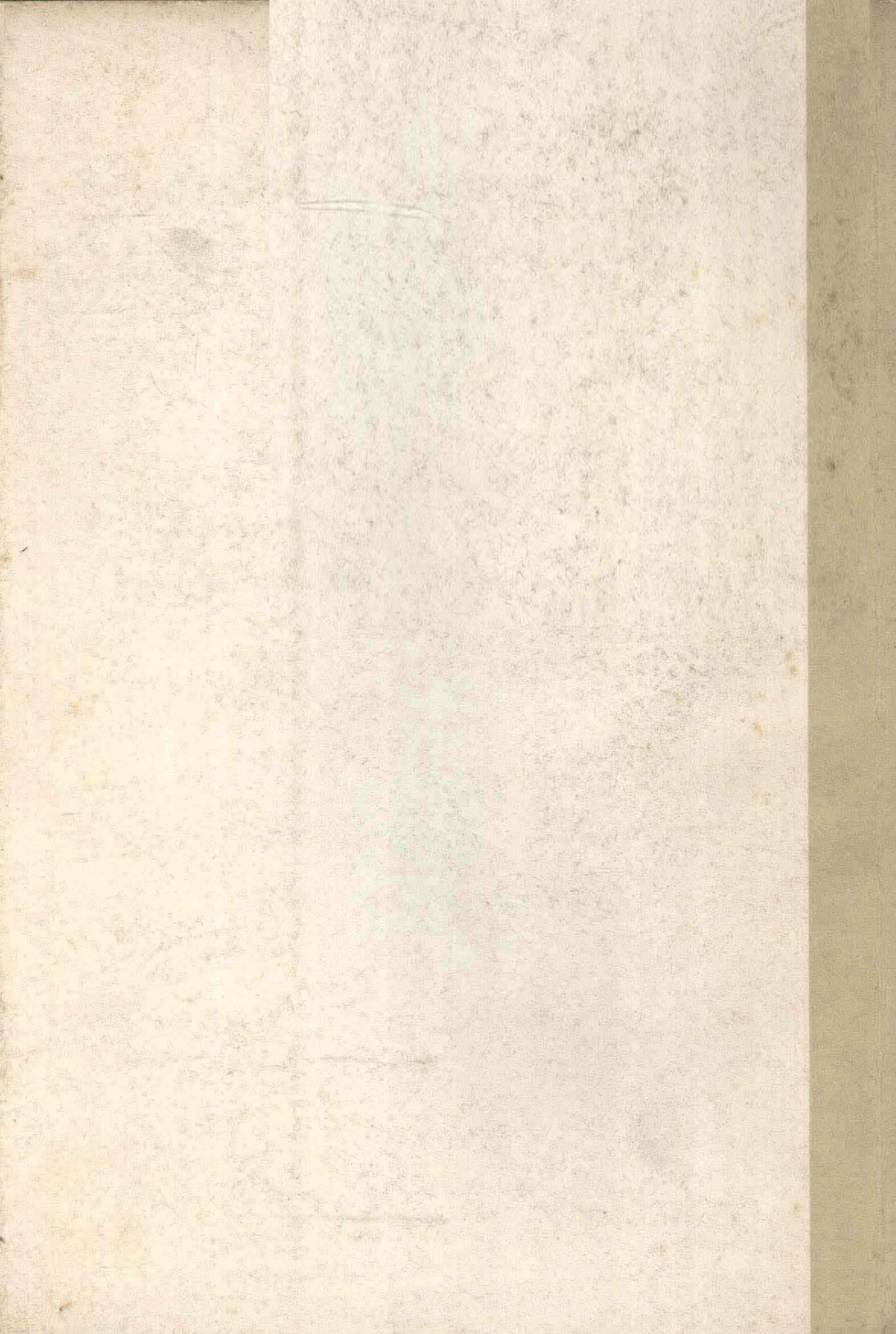




錢的大混战中吃亏最大，因為他們总是落在有錢的商人和富农的后面。他們从来没有什么儲蓄，过一天算一天，每逢遇到困难或者遭到不幸，他們就不得不把最后的一些家什抵押出去或者把耕畜賤价卖掉。一旦落在某个富农或者高利貸者的魔爪里，他們就很少有掙脫的希望，多半是完全破产。每年有成千成万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关上自己的門，白白地把份地交給村社，变成雇傭工人、雇农、粗工、无产者。富人在这个爭夺錢的斗争中却变得愈来愈富。富人把几千万、几万万的钱布收集到銀行里面去，他們不仅靠自己的錢发财，也靠別人存在銀行里的錢发财；小百姓把几十个或几百个卢布存在銀行里或儲蓄銀行里，每个卢布只得到三、四个戈比的利息；而富人把这許多小笔的錢合成几百万卢布，用这几百万卢布扩大自己的周轉額，每个卢布可以賺一二十个戈比的利潤。

正因为这样，社会民主党工人說：要消灭人民貧穷的唯一方法，就是自下而上地改变全国的現存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剝夺大地主的地产、厂主的工厂、銀行家的貨幣資本，消灭他們的私有财产而轉交給全国劳动人民。那时候，支配工人劳动的就不会是靠別人劳动过活的富人，而是工人自己和他们选出来的代表。那时候，共同劳动的成果以及各种技术改良和使用机器带来的好处，都由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来享受。那时候，財富会更快地增漲起来，因为工人替自己做工要比替資本家做工做得更好；工作時間将会縮短，工人的境况将会改善，工人的整个生活都会完全变样。

但是，改变全国的一切制度——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做很多的工作，需要进行很多长期頑强的斗

爭。一切富人、一切私有主、整個資產階級^①，將用全副力量來保护自己的財富。官吏和軍隊將要起來保護整個富人階級，因為政府本身就掌握在富人階級手里。工人應當万众一心地來反對所有靠別人勞動養活的人；工人自己應當聯合起來并把一切無產者聯合成一個工人階級，聯合成一個無產階級。對工人階級說來，鬥爭並不是容易的，可是在這個鬥爭中最後勝利的一定是工人，因為資產階級，或者說靠別人勞動養活的人是人民中的極少一部分。而工人階級是人民中的絕大多數。工人反對業主，就是幾百萬人反對幾千人。

為了進行這個偉大的鬥爭，俄國的工人已經開始聯合成一個社會民主工黨。不論這種秘密的、避開警察耳目的聯合怎樣困難，但是它還是在鞏固和發展起來。只要俄國人民爭得了政治自由，工人階級聯合的事業，社會主義的事業，會進展得無比迅速，比德國工人的這種事業進展得還要迅速。

3. 農村中的富和窮，業主和工人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社會民主黨人的要求是什麼。他們要同整個富人階級進行鬥爭來解除人民的貧窮。我們農村中的窮苦的情況並不比城市好些，甚至比城市還要壞。農村的窮苦情況多么嚴重，這點我們現在不去講。隨便哪個到過農村的工人、隨便哪個農民，關於農村的貧窮困苦、挨餓受凍的情形，都知道得很清楚。

① 資產者就是業主。資產階級就是一切業主合在一起。大資產者就是大業主，小資產者就是小業主。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也就是業主和工人、富人和窮人、靠別人勞動養活的人和替別人做工掙工錢的人。

可是农民不知道，他为什么貧穷、挨餓和破产；他怎样才能摆脱貧穷。要知道这点，首先就要明白城市和农村里的一切貧穷困苦是从哪里来的。关于这点我們已經简单地談过了，大家也已經懂得了，貧苦农民和农村工人應該同城市工人联合起来。但是这还不够。还应该进一步了解：农村中哪些人会拥护富人，跟着业主走；哪些人会拥护工人，拥护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知道：賺錢的本領和靠別人劳动过活的本領不比地主差的农民究竟多不多？不把这点弄得一清二楚，說多少关于貧穷的話都是沒有用的，农村貧民就不会了解：农村中哪种人应当联合起来并且同城市工人联合起来；怎样使得这种联合成为可靠的联盟，使得农民不仅不受地主的騙，而且也不受农民自己的弟兄——富农的騙。

为了弄清这点，我們現在就来看一下：农村中地主的势力是怎样的，富农的势力是怎样的。

先从地主談起。要知道他們的势力怎样，可以先从他們私有地数量上来看。欧俄的全部土地，包括农民的份地和私有地在內，大約有 24 000 万俄亩^①（官地沒有算在內，关于这一部分地我們以后单独来談）。其中屬於农民的，就是屬於 1 000 万以上农戶的份地，有 13 100 万俄亩。而在业主手里的，就是在不滿 50 万戶手里的有 10 900 万俄亩。这就是說，即使拿整数来算，每个农戶平均只有 13 俄亩，而业主每戶平均有 218 俄亩！但是，地的分配上的不平等还要厉害得多，这点我們在下面就会看到。

在业主的 10 900 万俄亩地中，700 万俄亩是封地，是归皇族

① 这里的和下面的有关土地数量的数字已經很旧了。都是 1877 到 1878 年的数字。可是沒有更新的数字。俄国政府只能在糊里糊塗的情况下存在，所以在我們这里关于全国人民生活状况的完整确实的材料，收集得非常少。

的。沙皇和他的家族，是俄国的头号地主，是俄国最大的地主。皇家一姓的地要比 50 万农户的地还多！其次，教堂和寺院所有的地，大约有 600 万俄亩。我們的司祭向农民宣傳不要貪財，要戒欲，而自己則巧取豪奪，抓到了大量的地。

另外大約有 200 万俄亩屬於各城市和市鎮，還有約 200 万俄亩屬於工商企業和公司。9 200 万俄亩地（確切的數字是 91 605 845 俄亩，但是為了簡便起見，我們引用整數）屬於不滿 50 万（481 358）戶業主。這些業主中有一半是很小的，他們每家所有的地不到 10 俄亩。他們的地總共不到 100 万俄亩。可是有 16 000 戶，每戶有地 1 000 俄亩以上；他們的地總共有 6 500 万俄亩。大地主手裡的地有多大，還可以從下面這個事實看出來：有將近 1 000（924）戶，每戶都有 10 000 俄亩以上的地，他們總共有 2 700 万俄亩地！這 1 000 戶所有的地等於 200 万农户的地。

很明顯，只要幾千個富人占著這樣大量的地，千百万人民就一定受窮挨餓，並且永遠會受窮挨餓。很明顯，要是這樣，那末國家政權，政府本身（雖然是沙皇的政府）也總是要被這些大地主牽著鼻子走的。很明顯，如果農村貧民自己還沒有聯合起來，沒有結合成一個階級來同這個地主階級作頑強的、殊死的鬥爭，他們是不能指望任何人和任何方面的幫助的。

這裡必須指出：我國有許多（甚至許多有學問的人），對地主階級的力量，有一種完全不正確的看法，他們說，“國家”的地要多得多。农民的這些狗頭軍師說：“俄國疆域（就是俄國的所有的地）的一大部分，是屬於國家的”（這些話是從“革命俄國報”第 8 号第 8 頁上摘下來）。他們的錯誤是這樣產生的。他們聽說歐俄有 15 000 万俄亩地是屬於國家的。這是事實。可是他們忘記了，

这 15 000 万俄亩差不多全是 最靠北面的地方——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果达省、奥洛涅茨省、維亞得卡省、皮尔姆省——的坏地和森林。就是說，国家的地都是一些到現在还完全没有什么用的地。而国家所有的可以耕种的地还不到 400 万俄亩。况且，这些可以耕种的国家的地（如在薩馬拉省，这种土地特别多），收很少的錢，甚至像不要錢那样租給了富人。富人把这些土地成千成万俄亩地租去，然后再用高出两三倍的价錢轉租給农民。

不，說国家有很多地的人，是农民的狗头軍师。的确，許多好地都是大地主（沙皇自己也在內）的，这些大地主还把国家本身也掌握在自己手里。当农村貧民还不会联合起来，不会經過自己的联合而成为一股可怕的力量时的时候，“国家”永远是地主阶级的馴順的奴僕。还有一点不应当忘記：以前几乎只有貴族才是地主。貴族現在也还有大量的地（在 1877—1878 年，115 000 戶貴族有 7 300 万俄亩地）。可是現在金錢、資本已經成了主要势力。商人和富裕农民收买了很多很多的地。根据統計，30 年来（1863—1892 年），貴族失去了（即卖出多于买进）值 6 亿多卢布的地。而商人和荣誉公民却买得了值 25 000 万卢布的地。农民、哥薩克人和“其他农村黎民”（我們的政府把平民叫做“黎民”，这样才能同“貴人”和“君子”分开来）买得价值 3 亿卢布的地。这就是說，全俄农民每年平均购置价值 1 000 万卢布的地。

可見，有各种各样的农民：有的受穷挨餓，有的发財致富。可見，那种接近地主的、会站在富人方面反对工人的富农，是一天天多起来了。所以，想同城市工人联合起来的农村貧民，应当很好地把这想一下，应当弄清楚：这样的富农多不多，他們的力量有多大，同这种力量作斗争我們須要怎样的联盟。我們剛才曾提到过

农民的狗头軍师。这些狗头軍师喜欢說：农民已經有了联盟。这个联盟就是村社、村团。村社是一种很大的力量。村社的联合紧密地团結着农民：村社农民的組織（也就是联合、联盟）是广大无边的。

这是不对的。这只是一种童話。这是好心人想出来的，可是到底还是童話。假使我們要相信童話，那我們只能把自己的事业弄糟，把农村貧民同城市工人联盟的事业弄糟。每一个住在乡下的人最好仔細地看一下自己周圍的情况：村社的联合、农民村团像不像农村貧民用来同一切富人，一切靠別人劳动养活的人作斗争的联盟？不，不像，而且也不会像。在每个村子里，在每个村团里，都有許多雇农，許多貧苦农民，又有自己雇用雇农和把土地买成“死契”的富人。这些富人也是农民村团里的人，而且在村团里是他們作主的，因为他們有势力。难道我們要这种让富人参加，让富人作主的联盟嗎？完全不需要。我們需要的是用来向富人作斗争的联盟。所以村社的联盟对于我們是沒有一点用处的。

我們需要自願的联盟，需要那些懂得他們应当同城市工人联合的人的联盟。但是村团不是自願的联盟，而是官办的联盟。入村团的不是那些給富人做工、想一起同富人斗争的人。所有入村团的人都不是自願加入的，而是因为他們的父母在这块地上住过，替这个地主做过工，是因为官家把他們編入了这个村团。貧苦农民不能自由退出村团；他們不能自由接收外人，即被警察編入別乡的人加入村团，可是我們为了使自己联合起来，可能正好需要外人加入到我們的联盟里来。不，我們要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联盟，是只有雇工和貧苦农民参加的、为了同一切靠別人劳动养活的人进行斗争而結成的自願联盟。

村社得势的时期早就过去了，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当村社得势的时候，农民中間几乎没有雇农和流浪全国找活干的工人，那时候几乎没有富人，所有的人都同样受农奴主老爷的压迫。而现在，錢成了主要的力量。为了錢，就是同村团的人，也像野兽一样打架。有錢的农夫压迫和掠夺同村团的人比一些地主还厉害。現在我們需要的不是村社的联盟，而是反对錢的力量，反对資本力量的联盟，是各个村团所有农村雇工同貧苦农民的联盟，是所有农村貧民同城市工人来同样地反对地主和富农的联盟。

地主的力量怎样，我們已經知道了。現在要来看一下富农不多，他們的力量怎样。

关于地主的力量，我們是根据他們田庄的大小，地的多少来看的。地主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自由买卖土地。所以，关于他們的力量，我們可以根据他們的地多少很准确地看出来。可是，我国的农民直到現在还没有权利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他們直到現在仍旧还是半农奴，还被束縛在自己的村团里。所以，关于富农的力量，不能根据他們的份地的多少来看。富农发财不是靠自己的份地；他們购买許多地，或者是买成“死契”（变成自己的私产），或者是买“几年”（即租地）；他們不但从地主那里买地，还从自己的农民兄弟那里买地，从抛棄土地和因为貧穷而出让份地的人手里买地。所以，最正确的办法，就是按馬的多少来分富农、中农和貧农。馬多的农民几乎总是富农；如果他有很多牲口，那就是說，他地也种得很多，他除了份地之外还有別的地，还有存款。而且我們也能知道：在全俄国（即整个欧俄，把西伯利亚和高加索除外），馬多的农民有多少。当然，我們不應該忘記：談到全俄国，我們只能一般地讲，因为在个別的县份和省份里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譬如，城

市附近的富农，往往馬并不多。有的人經營有利的蔬菜业，有的人馬虽然少，但是奶牛很多，并且做牛奶生意。俄国各地也有不靠土地发财而靠买卖发财的富农，他們开榨油厂、面粉厂和其他工厂。凡是住在农村里的人，都很了解本村或本区的富农。可是貧农要不被人蒙着眼睛去瞎碰，要能够清楚地知道，什么人是他們的朋友，什么人是他們的敌人，就應該知道，在全俄国一共有多少富农，他們的力量有多大。

我們現在就来看一看，馬多的农民和馬少的农民有多少。我們已經說过，俄国的农户一共大約有 1 000 万。他們現在大概一共有 1 500 万匹馬（14 年以前有 1 700 万匹，可是現在已經少了一些）。这就是說，每 10 戶平均有 15 匹馬。問題就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有許多馬，而很大的一部分人不是完全沒有馬，就是馬很少。沒有馬的农民至少有 300 万，有 1 匹馬的农民大約有 350 万。这些都是完全破了产的农民，或者是貧苦农民。我們把他們叫做农村貧民。他們在 1 000 万农户中占 650 万，就是說几乎占了 $\frac{2}{3}$ ！接着就是中农，他們每戶有两头牲口。这样的农民大約有 200 万戶，他們大約有 400 万匹馬。再上面就是富农，他們每戶有馬两匹以上。这样的农民有 150 万戶，可是他們有 750 万匹馬^①。这就

① 我們再說一遍：我們这里用的数字是大約的整数。富农不一定是整整 150 万，或者少一些或者多一些，也許是 200 万。但是这差不了多少。問題不在于把每一千戶或每一万戶都算进去，而在于明了富农的力量有多大，他們的地位怎样，这样才能够分清敌人和朋友，才不会受一切胡說和空話的欺騙，而是确实知道貧农的地位，特别是知道富农的地位。

希望每个在农村中做工的人都能仔細看一看自己的乡鎮和邻近的乡鎮。这样他就会看到，我們是算得对的，平均数字各地都是这样的：每百戶中有 10 戶或頂多是 20 戶富农，20 戶中农，而其余的都是貧农。

是說，大約 $\frac{1}{6}$ 的农户手里有全部馬的一半。

知道了这点，我們对富农的力量就能够看得很准了。他們人很少：在各村团、各乡里，每百戶中只有一二十戶富农。可是这些数目不多的农户是最富的农户。拿全俄国來說，他們的馬差不多同所有別的农户的馬加在一起一样多。这就是說，他們种的地也差不多等于全体农民种的地的一半。这些农民收获的粮食要比他們家庭所需要的多得多。他們把很多粮食卖出去。他們的粮食不只是自己吃，而大部分是为了卖出去，为了賺錢。这些农民能积蓄錢。他們把錢存到儲蓄銀行和銀行里去。他們在买地。我們已經說过，全俄国农民每年买很多的地，这些地差不多都是这些少数富农买的。农村貧民只想吃得上飯，哪里还能想到买地。他們連买粮食的錢都常常不够，哪里还有錢去买地。所以，一切銀行，尤其是农民銀行，決不是帮助全体农民弄到地（只有欺騙农夫的人或者大傻瓜才这样說），而只是帮助很少的农民，只是帮助富人弄到地。所以，我們上面提到的那些农民的狗头軍师在談到农民买地的时候，說地是从有錢人手上轉到了庄稼人手上，这是在撒謊。地是永远轉不到庄稼人手上来的，轉不到穷苦的做活的人手上来的；因为地是要用錢买的，穷人从来没有什么多余的錢。地只会轉到有錢的富农手上去，轉到有錢人手上去，只能轉到农村貧民应当同城市工人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去反对的那些人手上去。

富农不但买死契，他們論年租地也最多。他們租了大片的地，也就是夺去了农村貧民的地。譬如，在波尔塔瓦省的一个县（康斯坦丁諾格勒县）算过一笔賬：富农究竟租了多少地。結果怎样呢？租地 30 俄亩和 30 俄亩以上的农户很少，每 15 戶中只有兩戶。可是这些富农抓去了全部租地的一半，每个富农平均有 75 俄亩租

地！或者就拿塔夫利達省來說吧，有人算過農民用村社、村團的名義向國家租來的地被富人霸佔了多少。結果是总共只占農戶 $\frac{1}{5}$ 的富人，占有全部租地的 $\frac{3}{4}$ 。地到處都是按錢多少來分配的，而有錢的只有少數富人。

其次，現在農民自己也出租很多地。他們沒有牲口，沒有種子，沒有錢去種地，只好拋棄份地。現在沒有錢，有地也沒有用。就拿薩馬拉省新烏斯庫克縣來說吧，三戶富農里有一戶，有時有兩戶在本村團或者在別的村團租種份地。而出租份地的都是沒有馬和只有一匹馬的農民。在塔夫利達省，整整 $\frac{1}{3}$ 的農戶都出租份地。出租的份地占全部農民份地的 $\frac{1}{4}$ ，共 25 萬俄畝。在這 25 萬俄畝份地中，有 15 萬俄畝（ $\frac{3}{5}$ ）落在富農手里！這裡我們又可以看看，村社聯盟、村團，對貧民有沒有用？在村團里，誰有錢，誰就有勢力。可是我們需要的是一切村團的貧民結成的聯盟。

有人說農民可以很便宜地買到鐵犁、收割機和其他一切改良農具，這同農民買地的說法一樣，都是在騙農民。建立地方堆棧和勞動組合，並且說，改良農具會改善農民的生活，——這完全是撒謊。能夠得到這些好農具的只是富人，窮人差不多什麼也得不到。他們根本顧不上鐵犁和收割機，能活命就算好了！所有這一切“對農民的幫助”，不過是幫助富人罷了。大批的窮人不但沒有地，沒有牲口，也沒有積蓄，就算改良農具價錢再便宜些對窮人也沒有什麼好處。就拿薩馬拉省的一個縣來說吧，有人算過富農和貧農各有多少改良農具。算的結果是在全部農戶中占 $\frac{1}{5}$ 的最富的農戶，差不多佔了全部改良農具的 $\frac{3}{4}$ ；而在全部農戶中占一半的貧民，总共只占全部改良農具的 $\frac{1}{30}$ 。在全縣 28 000 個農戶中，沒有馬和只有 1 匹馬的農戶共有 10 000 戶；可是這 10 000 戶总共只

把六人小組和三人小組問題的爭論轉到这个罪名是否正确的問題上。他們中間誰也沒有提到这一点！他們中間誰也不敢說半句关于同六人小組和三人小組有关的各种色彩的原則区别。他們宁願采用更流行更廉价的手法——意气用事，說什麼可能使人感到受侮辱，并装模作样地說，編輯部問題已經由于任命“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而得到解决了。柯里佐夫同志为反对魯索夫同志而提出的后一个論据，簡直是瞎說。在代表大会議事日程上規定了——当然不是偶然規定的——两个单独項目（見記錄第 10 頁）：第 4 項是“党中央机关报”，第 18 項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編輯部”。这是第一。第二、在任命“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时，全体代表都坚决声明說这不是批准編輯部而只是批准方針^①，誰也沒有抗議过这个声明。

因此，认为代表大会批准一定的机关报其实就是批准編輯部这一說法，即少数派方面重复过許多次（柯里佐夫，第 321 頁，波薩多夫斯基，同上頁，波波夫，第 322 頁，以及其他許多人）的說法，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这是誰都看得清楚的手法，这种手法是要掩

① 見記錄第 140 頁，阿基莫夫发言說：“……据說我們將把中央机关报选举問題留到最后去談”；穆拉維約夫发言反駁阿基莫夫，說阿基莫夫“对于未来的中央机关报編輯部問題非常关心”（第 141 頁）；巴甫洛維奇发言說，我們任命了机关报，也就得到了“我們能够用来实行阿基莫夫同志所关心的那些手术的具體材料”，至于“火星报”應該“服从”“党的決議”，那是毫無疑問的（第 142 頁）；托洛茨基发言說，“既然我們不是批准編輯部，那末我們究竟是批准‘火星报’的什么东西呢？……我們不是批准名称而是批准方針……不是批准名称而是批准旗帜”（第 142 頁）；馬爾丁諾夫发言說，“……我也同其他許多同志一样，认为我們現在討論承认代表一定方針的‘火星报’為我們中央机关报的問題时，不应当涉及到选举方法或批准其編輯部的問題，這個問題留待以后議事日程的适当場合再談……”（第 143 頁）

意把中央委員會變成編輯部的工具”……(又唱起阿基莫夫式的調子來了：問題在於每一個黨代表大會上的每一個多數派隨時隨地都要努力爭取影響，以便在中央機關中爭得多數而把這種影響鞏固起來，但是人們把這個問題轉移到機會主義的誹謗方面去了，說什麼編輯部的“工具”，說什麼編輯部的“簡單附屬品”，正像同一個馬爾托夫同志在比較晚的時候說的那樣，第334頁)……“所以必須縮減編輯部委員人數(!!)。因此我也就不能加入這樣一個編輯部”……(請仔細看一看這個“因此”二字：編輯部什麼時候才能把中央委員會變成附屬品或工具呢？不是只有當編輯部在總委員會內擁有三票並且濫用這個優勢的時候才會如此嗎？這難道不是很明顯的嗎？同樣，當選為第三個委員的馬爾托夫同志隨時都能阻止任何濫用職權的現象，並以自己的一票來消滅編輯部在總委員會內的任何優勢，——這難道不也是很明顯的嗎？所以問題正是在於中央委員會的人選，而所謂工具和附屬品的說法只不過是一種誹謗而已)……“我和舊編輯部的多數認為，代表大會將會結束黨內的‘戒嚴狀況’而奠定黨內的正常秩序。誰知用非常法反對個別團體的戒嚴狀況仍然存在，甚至變本加厲了。只有在保存舊編輯部的全體成員時，我們才能擔保編輯部根據黨章享有的那些權利不會使黨受到危害”……

以上就是馬爾托夫同志第一次提出所謂“戒嚴狀況”口號的那段言論的全文。現在請看我對他的答復：

“……雖然我糾正了馬爾托夫所發表的兩個三人小組的計劃是私人性質的這樣一個聲明，但是我並不想反對馬爾托夫所說的我們不批准舊編輯部是我們所實行的有一個‘政治意義’的步驟的斷語。恰恰相反，我無保留地和無條件地同意馬爾托夫同志的意見：這個步驟是有巨大的政治意義的，——不

小小的簡單事實就是，馬爾托夫同志在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機關入選問題遭到了失敗。這一簡單事實的政治意義在於，黨代表大會的多數派在取得勝利以後就着手鞏固自己所爭得的影響，方法就是使自己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取得多數，建立起組織基礎，以便根據黨章克服多數派認為是動搖性、不堅定性和態度模糊的一切東西^①。在這種情況下懷着一種目瞪口呆的恐怖神情說什麼“爭取影響的鬥爭”，抱怨什麼“戒嚴狀況”，那只不过是裝腔作勢的空話，吓唬人的字眼罷了。

馬爾托夫同志不同意這一點嗎？那末我們要請問他，世界上有沒有這樣一次黨代表大會，是不是一般可以設想出這樣一次黨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的多數派竟會不去努力（1）使自己在中央機關內占多數，（2）使這個多數擁有克服動搖性、不堅定性和態度模糊的權力來鞏固已經贏得的影響呢？

臨到選舉的時候，我們代表大會必須解決一個問題：把中央機關報和中央委員會內三分之一的票數給黨的多數派呢，還是給黨的少數派？保留六人小組和通過馬爾托夫同志所提的名單，就是給我們以三分之一的票數，而給馬爾托夫同志方面以三分之二的票數。選舉三人小組為中央機關報委員和通過我們所提的名單，就是給我們以三分之二的票數，而給馬爾托夫同志方面以三分之一的票數。馬爾托夫同志拒絕同我們妥協或向我們讓步，並在代

① 火星報少數派的不堅定性、動搖性和態度模糊在代表大會上表現在哪里呢？第一、表現在他們在黨章第1條問題上說出的一些機會主義詞句；第二、表現在他們和阿基莫夫同志以及李伯爾同志結成聯盟，這種聯盟在代表大會後半期成長得很快；第三、表現在他們竟把選舉中央機關報負責人員的問題降低到一味表現庸俗觀念、專說無聊話以至籠絡人心的地步。在代表大會以後，所有這些可愛的品質表現得更厉害了。

表大会上用书面向我们提出挑战,而当他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时,他就如泣如诉地说起“戒严状况”来了!难道这不是无谓争吵吗?难道这不又是知识分子软弱性的表现吗?

说到这里,不能不令人想起考茨基不久以前对于这种知识分子软弱性所作的精辟的社会心理学的估计。现在各国社会民主党往往患同样的毛病,我们向更有经验的同志们学习正确的诊断和正确的疗法是很有好处的。因此,我们引证考茨基对于某些知识分子所作的估计,只不过是表面上离开本题罢了。

“……现在关于知识分子^①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问题又使我们产生了很大兴趣。我的同事们”(考茨基本人是个知识分子、作家和编辑)“一定会往往由于我承认有这种对抗而表示愤慨。但是这种对抗确实是存在的,企图(这里也像在其他场合一样)用否认事实的办法来掩饰这种对抗,那就未免是很不适当的策略了。这种对抗是表现在阶级上而不是表现在个别人物上的社会对抗。个别资本家以及个别知识分子是可能完全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也就会改变自己的性质。我在以后的叙述中谈的主要不是这种至今还是本阶级中例外现象的知识分子。在以后的叙述中,如果不特别附带说明,那我只是把知识分子一词了解为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以资产阶级社会为立足点的,是知识分子阶级的典型代表。这个阶级是同无产阶级有某种对抗的。

这种对抗和劳资对抗不同。知识分子不是资本家。虽然他的生活水平是资产阶级式的,并且他在没有变成流民以前不得不维持这种水平,但是同时他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且经常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往往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和一定程度的社会轻视。所以,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在经

① 我把德文 Literat, Literatentum 一词译为知识分子或知识界,因为德文 Literat, Literatentum 一词不只是包括作家,而且包括一切受过教育的人,一般所谓自由职业者,与体力劳动者不同的脑力劳动者(即英国人所谓 brain worker)。

濟上是没有什么對抗的。但是他們的生活狀況和勞動條件却是非無產階級的，因此在情緒上和思想上也就有某種對抗。

無產者在他還是孤零零的個體時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進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願望，都是從組織中，從他和同志們的有計劃的共同活動中汲取來的。當他成為偉大而強有力的機體的一部分時，他就覺得自己是偉大而強有力的了。在他看來，這個機體就是一切，而單獨的個體同這個機體比較起來是沒有多大作為的。無產者以最大的自我犧牲精神，以無名群眾的一分子的資格——毫不計較個人利益，毫不考慮個人榮譽——進行着鬥爭，他在指定的任何崗位上都履行自己的職責，自願地服從那貫穿在他的全部情感和全部思想中的紀律。

知識分子卻完全不是這樣的。他並不是這樣或那樣運用實力來進行鬥爭，而是利用論據來進行鬥爭。他的武器就是他個人的知識，個人的能力，個人的信念。他只有憑靠自己個人的品性，才可以獲得一定的意義。因此，在他看來，發揮本人個性的完全自由是順利進行工作的首要條件。他作為某個整體的從屬部分而服從這個整體是很勉強的，是迫於必要而不是出于本人心意的。他認為紀律只有群眾才需要去遵守，而上等人物是不必遵守的。至于他自己，當然是屬於上等人物之列的……

……尼采的哲學主張迷信超人，在這種超人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保證他自己的個性得到充分發展，認為對任何偉大的社會目的的任何程度的服從都是卑鄙可恥的事情，這個哲學完全是知識分子的人生觀，它使知識分子完全不能參加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

除了尼采以外，易卜生也是適合知識分子情緒的知識分子人生觀的出色代表人物。易卜生的醫生斯多克芒（在“人民公敵”戲劇內）並不像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是個社會主義者，而是個典型的知識分子，這種知識分子必然會同無產階級運動以及一般人民運動發生衝突，如果他企圖在這個運動中有所作為的話。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無產階級運動也和任何民主^①運動一樣是以

① 最能表明我們那些馬爾托夫分子把一切組織問題都弄得一塌糊塗的事實，就是他們在轉到阿基莫夫和 不適當的 民主主義方面時，卻又埋怨用民主手續選舉編輯部成員的辦法，即由大家預先擬訂而後在代表大會上進行選舉的辦法！先生們，也許這就是你們的原則吧？

(十八)稍微談談辯証法。两个变革

只要整个看一看我們党内危机的发展經過,我們就容易看出,斗争双方的基本成員,除了小小的例外,始終沒有改变。这是我們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間的斗争。可是,这个斗争經過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而每个想了解已有的大量文献的人,每个想了解許多摘录的指証、断章取义的引文、个别的責难等等的人,都必须对其中每个阶段的特点有一确切的認識。

我們且把各个显然不同的主要阶段列举出来:(1)关于党章第1条問題的爭論。这是关于基本組織原則問題的純思想斗争。我和普列汉諾夫两人处在少数地位。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人提出机会主义条文,因而投到机会主义者怀抱中去了。(2)“火星报”組織由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問題——是佛敏还是瓦西里也夫参加五人小組,是托洛茨基还是特拉文斯基参加三人小組——发生了分裂。我和普列汉諾夫爭得了多数(9票对7票),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我們在党章第1条的問題上占少数。馬尔托夫同机会主义者的联盟,具体地証明了組委会事件使我产生的种种焦虑。(3)关于党章細节的爭論的繼續。机会主义者又来援救馬尔托夫。我們又处于少数地位,并捍卫少数在中央机关内的权利。(4)七个极端机会主义者退出代表大会。我們成了多数并在选举中战胜了联盟(即火星报少数派、“泥潭派”以及反火星派的联盟)。馬尔托夫和波波夫拒絕接受我們所提出的两个三人小組中的席位。(5)在代表大会閉会以后因为补选問題而发生的无謂爭吵。无政府主义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詞句盛行一时。最不彻